

女“鸭司令”的创业曲

——记启东神旺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周丽芬

本报记者 刘嘉怡

在北新镇永安村,说起周丽芬,没有一个不佩服的。这个从浙江缙云农村走出来的“土坯子”,养殖规模越办越大,成为远近闻名的养殖女能人,还解决了永安村及周边村里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咕、咕、咕……”5月15日,记者走进位于北新镇永安村的启东神旺畜禽蛋鸭养殖基地时,面庞黝黑的周丽芬正在呼鸭喂食。

周丽芬为人谦和、朴实,柔弱的外表下有着知难而进、永不服输的坚强的心。1985年,正值花样年华的她,凭着

坚强的毅力和不怕吃苦的精神,创立了自己的公司——上海丽芬禽蛋加工厂,主要生产皮蛋、咸蛋和咸蛋黄。公司成立以来,周丽芬坚持以质量求生存,以优质的产品拓展销路。

“有段时间,夏天收购原料蛋回来后,经常发现有很多蛋已经变质了,我们只好倒掉,这等于把钱往水里扔呀,痛心而又无奈。”说起建立养殖基地的初衷,周丽芬滔滔不绝地打开了话匣子,“靠别人是靠不住的,一定要建养鸭基地,自己养鸭生鸭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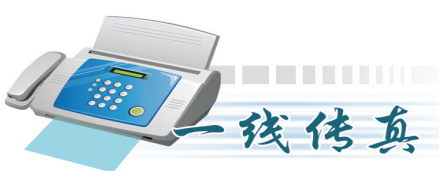
2007年,周丽芬看准启东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北新镇永安村成立了启东神旺

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并建起了启东神旺畜禽蛋鸭养殖基地。“我当时心里没有底,就是怕有风险。”周丽芬说。她专门去其他养鸭场进行观摩考察,详细了解种鸭的养殖、回收等情况。为了改良养殖技术,她不怕苦,不怕累,到处搜集购买科技养殖书籍,白天干活,晚上学习,逐步摸索并掌握了营养配比、疫病防治等科学的饲养管理技术。

合作社发展壮大的同时,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周丽芬向周边村长期雇佣了几十名员工,还在产蛋高峰期,为周边农户提供短期工作的机会,有效地解决了周边村里的部分闲置劳动力,改善了周边群

众的生活水平。

合作社现已发展社员100多人,存栏蛋鸭35万羽,日产鸭蛋500箱左右。每天将鸭蛋捡回来后,周丽芬就组织工人进行加工,产品销往本地及上海各批发市场和超市。“要做就要做最好的产品,我生产的咸鸭蛋,不咸不淡,口味符合大众的饮食习惯,生意不要太好哟。”周丽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南通市民兵哨所骨干集训在启举行

规范哨所建设 维护海防安全

本报讯 5月16日~18日,为期三天的南通市民兵哨员跨区联训在我市圆陀角进行,来自南通各县(市、区)的民兵哨所哨长及哨员20余人参加了集训。

集训中,南通军分区战备建设处领导作专题辅导。通过集训,帮助学员们学习侦察常识,提高民兵哨员情报获取与处置能力;掌握配备侦察雷达的操作使用和日常维护,发挥哨所对海侦察的作用;不断加强哨所规范化建设,确保常态运行、有效履职、能战管用。(潘瑾瑾 苏凯杰)

省中小学教研室教授李善良来启作专题报告

阐释教育意义 提升教研水平

本报讯 5月21日下午,江苏省中小学教研室教授李善良来到启东市第一中学,为全市近百位数学学科老师作了以“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学习体会”为主题的专题辅导报告。

报告中,李善良视角独特、点拨精确、内涵丰富,将中学数学的发展和新课程改革以来的数学课堂点点滴滴娓娓道来。并从教育发展的宏观角度进一步阐释了中学数学的教育意义和现实价值,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学习平台。(刘嘉怡)

市管局参与整治教育培训机构

整治违法行为 规范市场秩序

本报讯 今年5月至10月,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对教育培训机构开展不正当竞争等相关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以进一步规范培训机构市场秩序。

此次专项整治,重点检查面向中小學生举办的非学历文化教育类培训机构,其经营行为是否符合《反不正当竞争法》《合同法》《广告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发现有发布虚假违法广告、商业贿赂、合同霸王条款、消费欺诈、无证无照经营等违法行为的将依法予以处罚并公示。该局畅通投诉维权渠道,市民遇到纠纷可拨打12315和12345服务热线进行合理维权。(高利莉 朱俊俊)

5月24日,汇龙镇冬藏村一户村民正在地里收割油菜籽。连日来,我市油菜已进入收割季,农户纷纷抓住当前晴好天气有利时机下田收割。 潘杨摄

启东经济开发区半导体电子信息产业(上海)专题推介会举行

展示发展环境 促进合作交流

本报讯 5月22日下午,启东经济开发区在上海万和昊美艺术酒店举行2018启东半导体电子信息产业(上海)专题推介会。上海集成电路行业相关专家、集成电路行业龙头企业及集成电路行业有外迁或对外扩张意向的企业负责人、中介或投资机构负责人等30位嘉宾应邀参会。

据悉,半导体电子信息产业在启东有一定的发展基础,已形成了以林洋能

源、捷捷微电子、乾朔电子等为领军企业的集成电路半导体电子信息板块。尤其是近几年,启东经济开发区充分利用“上海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半导体产业聚集地”的契机,主动对接张江集电港、紫竹硅谷等产业集聚区,逐步成为上海半导体电子信息重要的配套和产业化基地;2016年又与上海交大合作成立上海交通大学电子信息与电气工程启东产业技术研究

院,全面打造科技成果转化基地、高端电子信息和电气工程中试放大基地。此次推介会,主要介绍启东良好的发展环境和产业基础,展示启东强劲的发展势头,让大家更好地了解启东、关注启东。

在互动交流环节,与会人员就感兴趣的人才、资金等政策问题展开互动交流,纷纷表示要来启进行考察和调研。(范存娟 夏辉)



(上接第1版) 也无法真正建成大美启东。

今年,我市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契机,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行动中,正式向这块“硬骨头”宣战,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力争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废品收购站点的清理整治工作。

“清理整治废品收购站是大家叫好好的民心工程,我们村有150家废品收购站点,目前已清理整治了145家。整治过程中,村民非常支持!”汇龙镇合兴镇村党总支书记黄士兵说。

堵疏结合规范发展

“其实,最让我感动的是废品经营者们的配合。”进驻五四村的工作人员单新海说。在

走访调查时,他几乎没有碰到所谓的“钉子户”。听说要开展整治行动,经营者们纷纷表示,将在规定时间内把废品处理掉,不耽误工作。

“收购废品是他们的谋生手段,一锅端肯定行不通,要为他们谋好后路,也要为百姓的废品处理需求想好出路,才能把这项工作做成真正的民心工程。”黄琛琛说。

清退散乱无序的废品收购站点后,如何

规范废品回收网络?在今年出台的《启东市废旧物品收购站点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对合法规范经营的废旧物品收购企业(站点),由市市管、公安、商务、城管、行政审批等部门会审确定,逐一登记造册,并汇总至市各主管部门和市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同时,按照“堵疏结合”的原则,由市住建局牵头,会同相关部门做好我市废旧物品

收购站点集中点规划及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工作,阶段性专项整治结束后,各镇、园区、街道经市政府批准同意后,负责将合法废旧物品收购站点迁至各规划点,制定统一完善的管理制度,实行规范管理。并将全市废旧物品收购站点清理整治工作纳入对各镇区的个性化工作考核,按照“属地管理”与“谁主管、谁负责”相结合的原则,建立长效管理机制,持续美化我市城乡环境面貌。

打响“废品围城”整治攻坚战

“边吸毒边消毒”的内参片

那时的内参片译制工作总是搞得神秘兮兮的。上译厂万航渡路大楼阳台通上面录音棚的小楼梯上还挂着一块“非工作人员请勿上楼”的牌子,所有参与配内参片的上译厂和上影厂的演员都是在被安排配某部戏时才知道那部戏的内容,没戏的时候他们就不能进棚,也不能打听,任何人回家都不可以透露任何有关内参片的事情给家人朋友听,更不可以把剧本拿回家,而每次内参片译制完成后厂里只留一本剧本存档,其他的立即上交并销毁。

1971年,北京发下了一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罗马之战》给上译厂,还要求十天内完成整部影片的译制工作。由于剧本不许带回家,演员又需要时间准备台词,厂里就在厂区大楼里临时准备了男女宿舍各一间,让所有参与内参片的演员职员带好毛巾、牙刷、替换衣服住在厂里,大家要去打地铺,要么就睡在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双层床上。苏秀记得那年市场上桃子特别多,大家就一脸盆一脸盆地买回来吃。在那十天里,大家除了录音、吃饭、睡觉,其他什么事都不干。

在集中大批精兵强将搞内参片的时候,为防止译制片的演员职员受资本主义电影“流毒”的影响,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驻扎在上译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针对每一

部内参片都要组织参与工作的相关演员职员搞大批判,大家“边吸毒边消毒”。而大批判需要有人牵头组织,这时他们想到了曾在奉贤干校组织过“大批判”的孙渝烽,于是他就成了厂里的“大批判负责人”。每次完成译制工作后,孙渝烽就要组织所有参与该片的同事对他们所配影片进行批判,人人发言,个个过关,口诛笔伐,人仰马翻,且每部影片的翻译、导演、主要演员还要进行重点发言。当时每当安排好一部戏的演员职员名单后,孙渝烽就赶忙不迭地打听是谁配主角,然后就跟他们打招呼,请他们准备后面的批判发言。后来由于来的片子太多了,最忙的时候厂里要同时配好几部戏,孙渝烽就请示工宣队和军宣队:“是否可以二三部戏合并一起批判?”对方回答说:“可以。”于是后来就一直这么做了。

当时大批判所用的语句无非是什么“麻痹劳动人民,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搞阶级调和,宣传剥削有理”等几句车轱辘话。有一次,黄佐临先生在演员休息室里坐在孙渝烽旁边的沙发上,在场的还有上影厂老演员高博。当时高博悄悄地跟孙渝烽



说:“小孙啊,这些稿子你都留着,将来换个片名和主角名字就可以了。”佐临先生看着高博笑笑,然后碰碰孙渝烽:“小孙,他说得有理。”

我妈记得有一次他们配的法国电影《漂亮的朋友》里有一支曲子旋律挺好听,于是就有人轻轻哼唱了,但却不知怎么就让军宣队听到了。他们马上如临大敌地说:“有的人配了片子就哼里面的歌了,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中毒了!”

当时每天早晨8点至9点厂里还有个“天天读”——就是全体演员职员每天上班就要读一个小时的“红宝书”。但在那一个小时内,大家基本上也就是戏少的打瞌睡,戏多的背台词,手上面是红宝书,下面是剧本。由于读完红宝书之后的9点整就要进

棚录音了,而大家在正式录音前都要准备台词,所以就借读红宝书的时间偷偷准备了。那时厂里那些根本不懂艺术的工宣队师傅还会在业务讨论会上不懂装懂地指指点点,有时导演定了配音名单交上去后,工宣队师傅也会煞有介事地指着名单发言:“哎,这个人你可要考虑一下。”而老厂长的应对策略

就是跟工宣队打马虎眼。遇到那种场面,他就坐在那儿跷着二郎腿,不疾不徐地回答:“哎呀,这个人嘛,思想上和艺术上要相辅相成的,可以提一下,让他注意点。你说政治上是吧?也让他注意点嘛!这个戏就让他试试,我们在录音过程当中批判一下。”于是通常也就这么过了。在整个“文革”时期,陈叙一经常拿这种话与工宣队和军宣队周旋。由于他打马虎眼的功夫“博大精深”,游刃有余,有些老演员就笑称他为“运动狐狸”。

在内参片的鼎盛时期,上译厂每年要译制多则四十部,少则二三十部的外国影片。跟搞样板戏一样,那时上海搞内参片时就算不是“举国体制”,也至少算是个“举市体制”了。此外,一到任务集中的时候,全

市几乎所有电影、戏剧、外语方面的大腕都会被召集来帮忙,于是万航渡路大院里一时间是群贤毕至,厂里是一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景象。我妈记得其中有一次上影著名演员达式常甚至是被上译厂从电影《难忘的战斗》拍摄现场临时调来的。那天达式常还穿着戏装,一身戏里角色的解放军军装,打着绑腿,等他的戏一配完,人就马上又被汽车送回拍摄现场去了。

有段时间里曾经有过好几部内参片同时到达的情况,陈叙一自己来不及翻本子,而已经借在上译厂工作的孙道临先生又要翻又要导又要配也来不及,因此就导致了剧本积压,于是英语功底深厚的张骏祥先生、黄佐临先生以及上海外语学院的几个大牌教授都被请来帮忙翻剧本了。后来黄佐临先生的女儿,上影厂著名导演黄蜀芹在她的文章里特别提到这件事,说她很感谢上译厂给了她父亲这个工作机会。到上译厂翻本子看戏是那个时期令“牛鬼蛇神们”颇为艳美的“美差”,她父亲在那段时间是比较愉快的,这让佐临先生暂时摆脱了作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黑线人物整天被批斗的命运。佐临先生后来说:“我总算还做了点业务的东西,而且我还能看到片子。尽管大批判时也还要说上几句,后来就好了,所以我感到是译制片厂让我追回了失去的青春。”(二十二)